

理论研究·实践研究

● 范并思

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型图书馆学

80年代初,中国图书馆学开始了一场深刻的全面的变革。变革的核心是使本世纪初创建的经验图书馆学朝着科学的、理性的新型图书馆学转化,以适应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革高潮迭起,持续了近10年时间,全方位地改变了图书馆学,包括整体构成的理论格局、理论观与方法论等。用一位古希腊哲人的话来形容这一情形是再恰当不过了:唯一不变的东西是变革本身。

一、剧烈变革的学科群

80年代的变革使以图书馆工作流程为主线索的学科组织方式受到根本性冲击。理论前沿转移了,传统学科出现了分化、重组,新旧理论大交接,新的学科不断产生。为了方便,本文将图书馆学内大大小小的、成熟或不成熟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均称为学科。

(一)新图书馆学的前沿学科群

80年代的理论变革中,一批新的学科异军突起,以其理论化程度高、紧扣现代化建设和宏观思维的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图书馆学的前沿。这批学科主要有4个。

1. 图书馆现代化研究。一般说,图书馆现代化有两层含义:图书馆技术的现代化和图书馆事业组织的现代化^[1]。广义的图书馆现代化研究起步于70年代末。当时许多有资历的理论家在“四化”目标鼓舞下讨论这一问题。80年代前期出现过两次高潮。先是80年代初对图书馆现

代化的含义、标志、意义等问题的研究,接着是1984年后对新技术革命与图书馆问题的研究。1985年后研究转入平稳,而对图书馆现代技术的研究逐步深入,并形成一门学科。它产生了巨大的效益。1986年后电子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有了突破性进展。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图书馆现代技术提高了我国图书馆工作的整体水平。

图书馆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变革意义巨大。它使相当多的图书馆学家改变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使图书馆学在“考证”的人文科学形象和“工作描述”的经验科学形象之外,有了“试验”、“论证”的技术科学新形象。它也改变了许多图书馆分支学科的研究路向,带动这些学科进行相应的变革。

2. 检索语言研究。图书分类学是一门根基很深的传统学科。汉代以来,我国图书分类研究关心最多的是与类目设置、顺序有关的知识分类问题。70年代末,著名的“三性”、“五大块”等讨论仍是知识分类问题的延续。图书分类的技术性问题虽有杜定友、刘国钧等人提出,但还是难免被转变为思想性问题的讨论。80年代初,一些理论家另辟蹊径,干脆放弃图书分类的名称,在“情报检索语言”名下研究包括分类法在内的各种检索语言的技术问题。这一变革大为奏效,理论家摆脱了“三性”之类问题的纠缠,将图书分类研究纳入了“以检索效率为中心”的新领域。

检索语言一词出现于1980年^[2],当时含义

较窄。1981年张琪玉《情报检索语言大纲》^[3]发表后,研究文章剧增。1984年《情报检索语言》^[4]的出版及随后此课程的普遍开设,标志着该学科真正形成。也许有人不承认检索语言研究与图书分类的学科渊源,但这并不重要。它从图书分类中提炼出了检索效率问题,和其它标引、检索工具问题一起组成了新的学科,这就从整体上改变了图书馆学的构成。

和图书馆现代化研究相比,检索语言研究有更多的创新意义。尽管国外早有检索语言这一名词,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建设,中国人走的是自己的路。一批最优秀的理论家,如张琪玉、侯汉清、刘湘生、丘峰,以其刻苦的治学精神和深厚的知识功底,使检索语言研究成为新图书馆学最活跃、最有创造性的前沿之一。

3. 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文献资源建设的概念是在藏书建设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1984年全国藏书建设会议上有同志建议以文献资源建设取代藏书建设,当年肖自力撰写了论文^[5]。随后这一概念被理论界普遍认可。经“七五”期间全国范围的文献资源调查及理论工作的推动,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已成为图书馆学中最热门、最有影响的一个分支。

50年代末出现的藏书建设概念,经过相当缓慢的发展,到20年代后期方形成学科。在经验图书馆学中,这一学科主要研究单个图书馆内藏书的选择、采集、组织、复审、剔除等微观问题。宏观决策的需求引导理论界关注宏观问题。1957年《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和1980年《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均涉及藏书的宏观组织问题。1981年肖自力开始注意馆际协调藏书的宏观理论,1984年后成为文献资源建设研究的重要内容。肖自力对文献资源建设宏观问题的关注并不全是个人兴趣,而是有决策因素的影响。

文献资源建设研究把一个单纯微观的研究领域发展为一个宏观、微观并重的领域。这种变化是经验图书馆学发展到新图书馆学的一个缩影。已有人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6]。它对中国图书馆学还有另一重要意义。中国图书馆学的

基本概念多数来自国外,从梁启超译入“图书馆”一词起,极少例外。文献资源建设概念的提出及研究领域的形成,是中国图书馆学家首次用自己的概念创立研究领域,并且没有一个术语如此科学地包容了这一领域的问题。在这一领域,中国站到了世界前列。

4. 发展战略研究。这是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型的图书馆学研究。它的目的是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提供思想、政策、决策依据和方案,具有“软科学”研究性质。发展战略研究使图书馆学既摆脱了“馆内科学”的局限,又避免了以往宏观课题的空洞,被人称为宏观现实问题研究。

在图书馆事业的早期,事业规模小,社会化程度不高,不需要国家对其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传统图书馆学中并没有发展战略研究。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萌芽于理论急剧变革的1983年,当时有人研究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中的图书馆事业^[7]。1985年上海结合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对该市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进行研究,使该研究转入集团作战。1986年湖南和全国高校系统分别组织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形成研究高潮。1988年后发展战略研究一度出现低潮。这是从起步阶段转向实质性研究的必然现象。实质性的发展战略研究需要充分的数据准备和详尽论证,较之课题周期较传统的论文式科研要长得多,成果数量也肯定要少得多。近年来发展战略研究又见回升。《中国图书馆学报》以刊载此类文章见长。它陆续发表了《公共图书馆:繁荣与危机》等一批具有发展战略研究性质的论文。论文的数据新且翔实,分析紧扣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决策思想。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新近推出的发展战略研究成果也颇引人瞩目^[8]。

与新图书馆学的其它前沿学科相比,发展战略研究起步晚,论著数量和参与者人数不多。但我们还是愿将其当作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就社会背景而言,它是改革开放以来管理决策科学化进程的产物;就理论自身而言,则是图书馆学的对象从馆内的、技术性问题向社会的、管理

性问题转变的产物。

(二)传统学科的变革

我国图书馆学的传统学科,主要有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以及按图书馆工作流程或要素组成的各个分支。图书馆学基础、藏书建设、图书分类等学科的内容部分或全部转变为前沿学科的内容,大部分学科则在保留传统的学科内容的同时,努力引入新的方法,开辟新的领域,用新的科学思想改造旧的学科结构和内容。新图书馆学中,它们名称依旧,但内容已不同于经验图书馆学科。

1. 图书馆学基础。它应是整个学科的科学基础,是从各具体问题和各工作环节抽象出来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但在经验图书馆学中,图书馆学基础教科书却有大量的对具体工作的经验描述。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图书馆学基础的“大批判”姿态,使一门应该最有理论性的学科被许多图书馆学家敬而远之。

1981年,理论界继初步清除了“左”的思想影响后,开始对经验图书馆学进行全面反思,并尝试建立新的、名符其实的基础理论。首先是彭修义提出了建立“知识学”的建议^[9]。以后周文骏的文献情报交流理论和宓浩的知识交流论均有突破性建树。1984年后,图书馆学基础研究领域形成多学派学说并存的多元化新格局。各学派学说不同程度地与传统决裂了,一批风格各异的专著或教材先后问世,向人们展示了这一领域内从结构到内容、从理论观到方法论、从思想深度到材料取舍水平的所有变革成就。

2. 目录学。它的历史远比图书馆学早。在古代,这是中外学术巨子们投身的领域。本世纪仍有余嘉锡、姚名达等学问家涉足。由于近代印刷业的兴起和出版发行体制的形成,目录学“校讎”的用武之地日减,没落也开始了。新中国的大学里,目录学是图书馆学系的一门专业课,昔日“显学”竟成了年轻的图书馆学系的一分支。课堂上,教师用极大的篇幅讲目录学的历史,以它过去的辉煌告诉学生它的重要。

在理论变革浪潮冲击下,目录学根深蒂固的传统虽依然维持着,但越来越多的人在尝试

使目录学由“古籍科学”变为与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交流相关的科学。在学科内涵方面,彭斐章提出了“以书目情报的运动规律为核心,探索目录学的发展规律”的全新思想^[10],并推出了专著^[11]。在学科外延方面,人们积极开创专科文献目录学、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新领域。在应用性研究方面,读者书目情报需求、书目情报网络、书目情报服务手段现代化等研究也很引人瞩目。今天的目录学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复杂的混合体,这本身就意味着目录学发生了巨变。

3. 图书编目研究。编目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编目研究中有注重技术问题研究的好传统。与分类研究一样,图书编目研究也是传统图书馆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60年代起,西方机器编目的实践导致编目思想的变革;主要款目地位下降,标识符作用显著。80年代,接触了西方新编目思想的学者开始了一场悄悄的革命:标准化运动。最先出来的《文献著录总则》向国际标准靠拢,内容完全是反传统的。直到1989年,还有理论家对多年前的这一标准耿耿于怀。但在当时,变革的氛围使人们对这一标准采取了既无人赞同也无人反对的姿态。这为《总则》的推行及以后其它标准问世创造了宽松的环境。新的著录格式为图书馆工作现代化作了多方面的准备,而以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推行新格式,正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即使仅有此一项,编目学家们的工作也无愧于这一理论变革的时代了。

4. 读者工作研究。包括文献借阅、参考咨询、情报检索、图书宣传和读者辅导等众多内容的读者工作,是现代图书馆活动中最有社会意义的工作。读者工作研究可计量性强,变化快,涉及面广。在西方,这是一个吸引了众多优秀理论家的领域,大量论证式、调研式课题均出自这一领域。不知为何,我国的理论家,尤其青年理论家却不愿光顾。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文献量以很高的速度增长。绝大部分文章可归入两类:讨论读者工作的定义、职能等基础问题的经院式文章,介绍某一图书馆读者工

作过程的经验描述式文章。新时期的读者工作是实实在在的上了几个台阶的,读者工作理论成果与其丰富的实践相比,毕竟过于沉闷了些。直到今天,读者工作研究中仍难见到变革的主流。读者工作研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引入数理方法。1983年起,陆续有人用排队论、信息论、运筹学知识进行探讨。陈和平以“流道论”为核心的图书馆定量管理系列研究成果是此类研究的精华^[12]。他的工作无疑已达世界先进水平,但研究读者工作的人知道他的不多。该领域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分支,如读者学、读者心理学,它们对这一领域没有产生变革性影响。

(三)新学科群的崛起

图书馆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发展不但表现为论著数量增长和理论的深化,也表现为各个分支学科的变化。80年代,出现了大量以“学”命名的新学科。80年代后期有人对此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喜好提出这类新学科是不务实的不良学风。客观地说,80年代前期的理论家们面对陈旧乏力的理论和大片的理论处女地,在疾行匆匆的开拓过程中,表现得的确有些焦躁。但后来的批评者们似乎不能体会理论大变革时期人们创建新学科的真实冲动,批评时忽视了新学科潮产生的理论环境。

新学科分支在图书馆学内大量涌现,是图书馆学理论变革时期的特殊现象,可视为新图书馆学早期的一个理论特征。尽管相当一部分今天实际已不存在,另有一部分发展不稳定,前途未卜,只有少数得到理论界认可,但新学科群的崛起对图书馆学的影响显而易见。

1. 交叉产生的新学科。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大趋势。理论变革过程中,相当多的人积极吸收其它学科的知识,创建了“图书馆社会学”、“图书馆经济学”、“读者心理学”等。图书馆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和其它学科交叉的结果,往往是其它学科知识在图书馆学的应用而不是相反。这是造成图书馆学新学科过多的一个原因。交叉类新学科的提出和建立,表明了图书馆学家决心走出封闭状况,跟上当代科学潮流的愿望。当然要使这些新学科成

为名符其实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还有许多理论工作要做。

2. 研究领域扩大产生的新学科。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and 图书馆活动内容的扩大,导致理论领域的扩大。如随着各类型图书馆的发展,继公共、科技、高校3门专门图书馆学后,又陆续产生军队图书馆学、儿童图书馆学、乡镇图书馆学、中学图书馆学。这些图书馆学往往有专门机构支持,有稳定的研究队伍,是较有潜力的图书馆学新学科。但由于开掘不深,存在“专门”不专,缺乏特色的问题。

3. 引入新方法形成的新学科。对方法的关注是80年代理论的重要特征,它势必导致新学科出现。如国家间比较方法导致比较图书馆学,数学、统计学方法导致图书情报数学和图书馆统计学。此类新学科一般比较成功。用一种传统图书馆学不曾有的方法研究图书馆学,往往能达新的理论境界。

4. 对原有领域研究深化而形成的新学科。这里既有部分深化而形成的,如对图书馆事业的深入研究而形成的宏观图书馆学、发展图书馆学,也有对整个领域深化而形成的,如由图书馆学基础而来的理论图书馆学,读者工作研究而来的读者学。后者可以说算不上新学科,它是理论变革时期人们追求理论体系完整的一种表示。纷纷将不带“学”字的改为带“学”字的,从这点也可看到当时人们的理论心态。

5. 还有一种其实是学派学说的“新学科”,如“知识学”、“文献信息学”。它们虽称为“学”,但实际只是图书馆学基础领域的一些学派学说名称。它们也属于新图书馆学。

二、新旧交替的理论特征

学科结构和内容急剧变革的同时,理论观、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等属于科学思想的东西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新旧观念碰撞和交接不断。新的科学思想的确立较好地保证了那些已开始变革的学科能沿着变革的路线走下去,也使一些学科结构变化不大的领域,因观念和方法的

更新达到了全新的境界。

图书馆学科学思想的变革发生在整个图书馆学研究中,涉及面很广。以下四方面的变革是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它们改变了经验图书馆学的4个理论特征。

(一)从经验描述到科学精神

图书馆学论文里有一类简单介绍个别图书馆个别工作环节工作过程或体会的文章。这类文章在其它学科是不存在的。一些理论教科书中,介绍的虽是全体图书馆的工作,但其内容也是人们可从图书馆工作中直接观察简单记录而得到的结论。这在其它学科也很少见。这种科研方式可称为经验描述。经验描述是导致理论落后、脆弱的主要原因。它是一种惰性的力量,至今仍未在理论界绝迹,且时有人为其辩护。

有人以为经验描述的研究方式来自杜威。这并不正确。杜威的经验图书馆学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图书馆学成果,其核心思想至今没有过时。他的分类法标记符号是改善工作效率的范例。他的“三最”原则:“以最小的代价,为最多的读者,提供最好的读物”(The best reading for the largest numbers at the least cost),至今仍是美国图书馆的座右铭(该原则1988年为ALA重申)。这一原则是杜威图书馆学核心思想的体现。从我国早期图书馆学著作中,不难看到杜威图书馆学的影响。可惜的是后来,特别是“文革”中,没有跟上战后世界图书馆学发展潮流,以至课题老化,方法陈旧,加上人才奇缺,终于导致经验描述的科研方式泛滥。在诸如“我馆如何为读者服务”一类文章中,不但现代科学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荡然无存,而且与杜威经验图书馆学的追求也相去甚远。

从经验描述到科学精神的转变发生在整个80年代。一批接触过现代科学方法或了解西方先进图书馆学思想的青年在这一转变中起到很大作用。1981年芝加哥学派被介绍过来,1982年谢拉的《关于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译出^[13]。刘迅的《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14]正面批评以经验描述为核心的我国经验图书馆学。1984年前后,基础领域内的各种新学派均十分

注意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抽象,以科学的精神研究图书馆问题。抽象思辨、数理方法、调研论证,科学的、理性的图书馆学精神受到崇尚。尽管80年代后期出现过反复,但变革经验描述式图书馆学研究的潮流并未逆转。

这一变革是图书馆学理论最重要的变革。所触及的是自有图书馆学以来“致用”的科研传统所积淀的东西,也是经验图书馆学中那种与图书馆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东西。它试图破坏传统的“理论文化”,确立一种新的图书馆学精神。如此深刻的变革现在还远未完成,但新图书馆学已展示了变革的前景。

(二)从微观领域进入宏观领域

图书馆学宏观研究有两种很不相同的解释。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将基础理论当作宏观研究^[15]。按这种解释,图书馆学宏观研究并不晚于微观研究。我们则更倾向于陈源蒸《宏观图书馆学》中的看法,将“从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去研究各项业务的社会化问题,”及“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图书馆之间的关系”等当作宏观研究^[16]。宏观研究的兴起,是新图书馆学的重要理论特征。它表明图书馆学从“馆内”科学变为“社会”科学。

近代图书馆学产生于图书馆事业的早期。理论要解决的是以个体图书馆活动为中心的技术问题,而不是图书馆事业的整体组织问题。这一传统,从诺德到杜威均没有改变。30年代巴特勒较早发现了图书馆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不利于巴特勒思想的传播。战后图书情报事业的迅速发展,方使他的弟子谢拉如鱼得水。以谢拉的《图书馆学导论》中可以看到西方图书馆学家对国家管理的关注。《温伯格报告》就是理论界参与图书情报政策与战略研究的典范。

改革开放前,西方图书馆学转入宏观研究的新变化并未及时引起我国图书馆学界对经验图书馆学的反思。即使在80年代前期,我国政策制定与政策研究脱节的现实仍使理论家无法真正涉足宏观领域。理论中要么是技术问题研究,要么是基础问题研究。80年代前期人们将

精力过多地投向学科的对象、性质一类课题,与那时宏观研究没有兴起也有很大关系。

80年代初图书馆管理和图书馆立法两个热点问题标志着微观研究已开始向宏观研究转化。但那时的研究带有过多的讨论和思辩的性质,更像是基础研究。1985年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开始后,调研、论证或研究才真正出现。发展战略和文献资源建设研究兴起后,中国图书馆学才真正完成了从微观领域到宏观领域的变革。《宏观图书馆学》一类专著的出现,标志着图书馆学的宏观研究已为理论界认可。

图书馆学从微观领域进入宏观领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但这一发展并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拓广可以实现。传统的科研方法、思想观念和科研组织方式并不能适应宏观研究。为此,需要变革经验图书馆学。从现在的情况看,宏观领域已经开辟,但习惯于微观研究的人耕种其中,收获并不可观。变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三)从批判式研究到建设式研究

如果说我国经验图书馆学中经验描述和微观研究这两个特征与杜威的图书馆学多少有些渊源的话,那么批判式研究这一特征,则完全属于东方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即具有批判的理论风格。以后中国图书馆学继承并光大了这一风格。最初是50年代对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批判。50年代末开始,这种批判似乎过头了。在很长时间里,提出新理论的文章似乎远不及批判这些理论的文章多。批判氛围中,理论建设困难重重,新思想很难产生。

80年代理论变革开始后,由于传统理论与现代图书馆学思想格格不入,主张变革的人们再掀批判高潮。批判的目标是对着理论中“左”的东西和经验的東西。这次批判与以往的批判有了质的变化,理论批判的目的是为建设开道。在批判经验图书馆学的同时,新的理论也雨后春笋般出现。1985年前后,新图书馆学理论已经可以无阻力地建立了。这时仍有一些人在反复地批判1981年以前的图书馆学。批判的惯性力时常诱导人们在一些概念上咬文嚼字,争论不休。1986年建设式图书馆学的呼吁出现

了^[17]。呼吁者主张以建设新理论的责任感代替批判旧理论的危机感,绕开一些一时争论不清的概念,用理论建设的实践来检验理论的真理性的。

批判式研究虽然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却根深蒂固。80年代后两年,对以往的理论探索进行批判的文章迅速增多。批评对象甚至包括标准化运动和现代化研究。也包括批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比较一下国外就不难发现,这种批“学风”的文章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有人不同意兰开斯特的无纸社会理论,他只会写《亚述巴尼拔的永恒模式》^[18],而不会批兰开斯特的理论中看不中用,更不会说他学风不正。对学风的批评只是一股支流。理论的总走向是由学科的发展决定的,变革在80年代后期没有逆转。在绝大多数学科中,人们保持着建设新理论的热情。图书馆学时常冒出对学风的批评,表明要完成从批判式研究到建设式研究转变的任务是何等艰巨。

(四)理论格局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按照传统的认识,科学理论是高度统一的,图书馆学应有唯一的理论基础,一套相应的方法论,构成唯一的体系。体系的内容和结构是唯一的,各种术语也有权威性解释。这样的理论构成是一元的。现代科学主张多学派并存的多元化格局,多种理论体系同时存在,不同的体系不但内容与结构是多样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也可以不同。多元化格局构造了建设式研究的基础。一般说,不同的理论体系或学派之间是无法通过相互批评而达成一致的。最终检验各种理论的,是理论的内在逻辑性、解释事物及预测事物发展的能力等。

图书馆学家曾坚信理论的统一性。刘国钧以为图书馆学可研究图书馆五要素。不同意这一主张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建立一个另外的体系与其竞争,而是要驳倒这一理论,然后再看图书馆学应该研究“矛盾”还是“规律”。这一思想方式延续到80年代。有人提出“世界3”理论可作为图书馆学的基础,一时间有人反驳有人辩护,争辩双方谁也不去在自己选定的基础上发

展理论体系,似乎不搞清楚这个理论基础,理论就无法发展。类似的纠纷也广泛存在于学科定义、性质、职能等问题上。

1984年,事情有了转变。这年底杭州的基础理论讨论会上,代表们放弃了编一本大一统教材的想法。这实质上开辟了走向多元化之路。执不同见解的人可以编不同教材,以往那些概念上的纠纷也立即成为多余。关于这次会议的一篇综述提到鼓励出学派^[19]。1986年,出现了系统地多元化格局辩护的文章^[20]。至此,走多元化道路,通过学派建设来发展理论已成为共识。

多元化格局造就了一种宽松的理论环境,建设新理论的成功与否成了学术竞争的主要因素。没有多元化的理论格局,建设式图书馆学不可能形成。

三、科学组织方式的革命

80年代作为图书馆学一部分的学术刊物及论著、科研机构、课题组织等因素,也有了与经验图书馆学时期完全不同的变化。这是图书馆学组织方式的一场革命。

(一)刊物革命

学术期刊是现代科学新理论的主要载体。刊物的学术水平反映着学科水平。刊物的理论兴趣和理论风格往往与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经验图书馆学时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种学术刊物,刊物出版发行不规范,栏目呆板陈旧,刊名多冠以“工作”、“动态”、“通讯”。

刊物革命开始于1979年。1978年创刊的学术刊物,名称和以前还没什么区别,如《黑龙江图书馆》,安徽的《图书馆工作》。1979年起了变化。四川、辽宁、吉林的刊物分别为“学报”、“学刊”和“学会会刊”,天津是“工作与研究”。不仅名称令人耳目一新,而且这年创刊的刊物姿态也是积极进取的。其中《图书馆学通讯》及吉林、四川两地的刊物对当时的思想解放和1980年理论高潮的到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那时至今,刊物革命一直在进行。地方性刊物在刊

名中去除代表地方的限定语,各种刊物选择具有理论性价值倾向的限定语。进行过这类改名的有近20种。“研究”、“探讨”、“论坛”一类鼓励探索的栏目受到几乎所有刊物的重视。有的还通过“笔会”、“专栏”、“专稿”、“编者按”等形式,有意识地引导理论高潮。变革的源头,都可看到刊物的这种主动作用。刊物的种数和年发稿量均有了跳跃式增长,质量更有突破性提高。与五六十年代的相比,不难看到它们的改变是革命性的。

(二)著作革命

社会科学中,学术专著是重大发现或经典理论的主要传播媒介。学派学说的确立,思想体系的确立,一般离不开学术专著的作用。80年代前期,学术著作的数量增长也是跳跃式的。著作数量的增长繁荣了图书馆学。可是,当时著作数量增长还不具有革命性变化,人们的著作方式还没有摆脱经验图书馆学。

中国经验图书馆学的著作方式,一般说来有3个特点:由于学科具有职业教育性,因而著作往往具有教材的性质;学科的主要理论是外来的,因而译著较多;由于学科的应用性强,著作中有大量工具书及使用说明。图书馆学早期著作多兼有教材和编译两种特性。各种“仿杜”分类法是工具书。只有目录学史方面有著作例外。80年代前期的情形也差不多,教材(含教学参考资料、自学或业务辅导资料,等)、译作(含编译)和工具书(含使用说明),再加上论文集,便构成了学术著作的主体,“著书不立说”现象十分普遍,能够成为学科经典或学派旗帜的著作极难出现。

1986年出现转机,一本薄薄的《文献交流引论》^[21]问世。这是一本有鲜明理论倾向的书。此后几年,又出现一批值得一提的著作。1987年《宏观图书馆学》,其框架不是“基础—应用”或“一般—具体”的传统学科式,而是问题,如“社会化”、“文献资源”、“计算机”等。1988年的《图书馆学原理》^[22]是一部专著式教材,“知识交流学派”的经典。1989年《图书馆定量管理》是通过对一个图书馆的流通工作进行大量研

究,由此形成的系统的定量管理思想体系的著作。1986年以后开始的著作革命,目前还在进行中。

(三)机构革命

中国经验图书馆学是自发进行的,几乎没有什么科研机构,也没有什么机构来进行组织。1925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对事业推动是成功的,但对学术研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80年代,有3类机构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

1. 1979年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先后成立的各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学会、其它地方性或行业性图书馆学会,是图书馆学研究的重要组织者。相当大部分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都是由它们直接或间接组织的。学会成员的广泛分布及学会对学术活动的广泛参与,是新图书馆学组织方式的一个大变革。

2. 文化部图书馆司、全国高校图工委及各地各行业的图书馆职能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图书馆事业而不是理论研究。但在新图书馆学中,这类机构对理论研究的作用却十分明显。图书馆司组织了《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的编写,该书作为《当代中国》丛书的分卷即将出版。全国高校图工委办有学术刊物,组织了学术会议,并实际上组织了全国文献资源的大型调研。职能机构的这种作用也是新图书馆学独有的。

3. 不少图书馆院系建立了图书馆学研究所(室),一些大型图书馆内也有专门进行科研工作的机构。

各类机构组织和参与图书馆学研究,对理论的推动是巨大的。就科研组织方式而言,这是对经验图书馆学个体的、分散的研究方式的一场革命。

参考文献

1 张琪玉等. 图书馆现代化简介及展望. 长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1:129

2 付兰生. 关于统一检索语言问题的一些看法. 科技情

报工作,1980,(5):18~19

3 张琪玉. 情报检索语言大纲. 图书馆学刊,1981,(3):54~66,(1):8~20

4 张琪玉. 情报检索语言.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238

5 肖自力. 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和高校图书馆的使命. 大学图书馆通讯,1984,(6):3~11

6 杨沛超等. 从藏书建设到文献资源建设. 情报资料工作,1991,(5):5~7

7 张克科.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中的图书馆事业. 图书馆学研究,1983,(1):4~14

8 白国应等.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工作发展战略. 图书情报工作,1992,(1):1~8(2):1~6

9 彭修义. 关于开展“知识学”的研究的建议. 图书馆学通讯,1981,(3):85~88

10 彭斐章. 目录学与时代. 图书馆,1992,(1):1~5

11 彭斐章. 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274

12 陈和平. 图书馆定量管理. 西安:西安交大出版社,1989:165

13 (美)谢拉. 关于图书馆学的基本原理. 图书馆学通讯,1982,(2):65~69

14 刘迅. 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 图书馆学刊,1983,(4):1~11

15 黄宗忠. 图书馆学导论.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398

16 陈源蒸. 宏观图书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59

17 范并思. 关于当代建设式图书馆学的思考. 图书馆学通讯,1986,(3):75~78

18 Perter Briscoe等. 亚述巴尼拔的永恒模式. 大学图书馆通讯,1988,(2):54~59

19 宓浩,邵巍. 关于图书馆学对象的新争论. 图书馆杂志,1985,(1):11~14

20 范并思. 多元化:选择与归宿. 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1):35~39

21 周文骏. 文献交流引论.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156

22 宓浩. 图书馆学原理.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317.

范并思 1988年毕业于华东师大情报系硕士,现为该系副主任。在20多种刊物上发文50多篇,出版专著5种。通讯地址:上海华东师大情报系,邮编200062。

(来稿时间:1992-06-06,编发者:刘喜中)

ABSTRACTS IN PUBLICATION

(279~298)

From Empirical Library Science to New-type Library Science — A Comment on the Theoretical Change in the Eighties / Fan Bingsi. — 3~10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has achieved a change from empirical library to a new-type one in the 80s and a radical change has been taken place in the fields of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mode of thinking and method of study,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one is that from empirical description to scientific spirit. 22 refs.

Library science — Theoretical chang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 China

G250.9

The Production of Libraries / Yu Mingdi and Na Chunguang. — 11~15

By the time when libraries are going in for material production activities, they are also carrying out those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 e. re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nd reproduction of users. The productive activities of libraries are of double nature — the material production,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ose activities that produce value as wel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et hold of this point of view for evaluating social functions of libraries. 13 refs.

Library science — Theories

Libraries — Nature

G250-03

The Initiative Contribution of Liang Qichao to the Study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Scientific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a / Li Wanjian. 16-21

Being a celebrated political activist, thinker and scholar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Liang Qichao was also a bibliognost, an erudite and a man overflowing with talent. Throughout his life, he left to the world a variety of writings covering economic, philosoph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ubjects which numbered about 14 million words and more, among which there are more than 10 books on bibliography, such as: Abstracts of Western Books, Bibliographical List of Western Learning, etc. He held that bibliography should serve the social change and make things easy for the users' convenience. He also put emphasis on the bibliographic function of guiding the users to read. His theory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set a precedent for the scientific system of bibliographical classific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ibliography of China. 24 refs.

Liang Qichao — Appraisals and evaluations

Bibliography — Modern times

G257